

## 学林

← (上接9版)

零把他准备参加会议的有关《子弹库战国楚帛书》的论文油印稿(缺帛书释文和考证)送给饶先生。饶先生对李零的著作非常重视,经常有所参考和引用,他在给我的信札中,经常关心“李零书出版未?”在1985年的一通信札中还提到“港中华书局告知《楚帛书》可于七月中旬出版”。因为我们的《楚帛书》有些地方参考或引用了李零的《子弹库楚帛书》,故先生一再告知香港中华书局,一定要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李零的《子弹库楚帛书》后,再出版香港版的《楚帛书》,并且说“这是学术界的规矩”,由此可见,饶先生作为学术大师的风范实在令人钦佩!

二是关于《饶宗颐史学论著选》的篇目及请季羨林先生作序。1982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三卷本的《选堂集林·史林》。我曾经在香港《大公报》“艺林”发表过一篇读后感,指出此书与钱锺书先生的《管锥篇》可并称为“南北学林双璧”。1984年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邀约,正欲编纂《饶宗颐史学论著选》一书,作为内地介绍饶先生的第一部著作,并请季羨林先生为此书作序。饶先生对此非常重视,除从《选堂集林·史林》中提及其他有关篇目外,还积极补充其他相关资料,进一步加以充实。在1987年10月23日信函的右侧边缘上写着密密麻麻、芝麻大小的小字,云:

弟潮州市故居事,曾函吴南生先生,请其主持。昨间于宴会上晤见潮州市书记及副市长,均告该产即可发还,并能协助与暹罗方面进行交换商量诸事。余已请泰京友好侨领郑君出面调解,希望可以成事。南生先生见面时,请代为致谢!

前段时间,有友人传来一封饶宗颐先生致季羨林先生的信札,信中提及请中大曾宪通君面陈款曲,请季老为题写“饶锺纪念馆”五字的匾额事。信中提到:“所以敦请先生题榜者,因先君著有《佛国记疏证》,惜已散佚,颐之从事梵学,实受诸庭训,未敢忘本。敬乞先生文字,用述先德。”时间是在11月15日。另据本人记事本的记载,1991年11月13日晨饶公来电嘱办数事,其中就有请季羨林先生题写“饶锺纪念馆”五字,可用小字书写再放大刻匾。这段记载与饶公致季老书所言相符,可以印证。加上此信所言故居之事,三者正可以互相说明。但此事几经周折,在潮州市政府的主持下,后来演化为在饶家“荣成号”榨油厂旧址的基础上建造“饶宗颐学术馆”(即

在写给我的书札中,多次提到这些珍贵资料,并由我带交给广东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杨樾先生。这部《明本潮州戏文五种》得到饶宗颐及李一氓、吴南生等先生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印成,在潮剧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。

**选** 堂书札的第三个时段开始于1989年,这一年的7月13日饶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了“老”的问题。信中说:

我近时目力已大不如前,深觉“老”之已至,作书写画,尚可胜前,獭祭钻研,已感吃力,幸记忆与联想力,犹未衰退。方将平生论文结集删订,以后惟从事译述,以排遣岁月。

这通书札十分重要,是饶公此后近三十年发展路径的最好表述。按照饶公自己的描写,这里的所谓“老”的表现,一是目力大不如前,二是獭祭、钻研已感吃力。信中的所谓“獭祭”,是指罗集经典名句成文者,乃饶公和钱锺书两位最为擅长的一种文体。所幸这时的饶公记忆力与联想力尚未衰退,作书写画尚可胜前,这就是饶公晚年大量创作书画作品的原因所在。从这批选堂书札可以看到,自饶公发现自己“老”之已至以后近三十年间,他自己所处理的重要事项。现加以梳理并略作说明。

一是筹建“饶锺纪念馆”。在1987年10月23日信函的右侧边缘上写着密密麻麻、芝麻大小的小字,云:

弟潮州市故居事,曾函吴南生先生,请其主持。昨间于宴会上晤见潮州市书记及副市长,均告该产即可发还,并能协助与暹罗方面进行交换商量诸事。余已请泰京友好侨领郑君出面调解,希望可以成事。南生先生见面时,请代为致谢!

前段时间,有友人传来一封饶宗颐先生致季羨林先生的信札,信中提及请中大曾宪通君面陈款曲,请季老为题写“饶锺纪念馆”五字的匾额事。信中提到:“所以敦请先生题榜者,因先君著有《佛国记疏证》,惜已散佚,颐之从事梵学,实受诸庭训,未敢忘本。敬乞先生文字,用述先德。”时间是在11月15日。另据本人记事本的记载,1991年11月13日晨饶公来电嘱办数事,其中就有请季羨林先生题写“饶锺纪念馆”五字,可用小字书写再放大刻匾。这段记载与饶公致季老书所言相符,可以印证。加上此信所言故居之事,三者正可以互相说明。但此事几经周折,在潮州市政府的主持下,后来演化为在饶家“荣成号”榨油厂旧址的基础上建造“饶宗颐学术馆”(即



1995年11月,选堂先生与曾宪通在潮州开元寺考察唐代经幢

“颐园”,饶公尊翁饶锺先生的事迹也陈列其中),并将东城区下东平路305号原“天啸楼”宅院开辟为“饶宗颐故居”,成为潮州市两处著名的人文景观。1998年5月,我追随饶公参加北京大学百年华诞汉学研究国际会议,提交了一篇《潮州饶宗颐学术馆记》,文载《文化的馈赠——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),将潮州饶宗颐学术馆推向国际学术界,潮州市府此举深获好评。

二是增订《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》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。

饶宗颐先生和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云梦秦简日书研究》《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》及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楚帛书》三种著作,在内地不容易看到。因此,北京中华书局想请饶先生修订后印行内地版,以应需求。但饶先生在来信中表示,自己实在没有时间逐一修订,独立成书,故建议将三者合一,由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内地版。关于这本内地版的书名,饶先生在来信中有多次讨论。因为新的书名需顾及三种出土材料的地点、时代及内容性质的不同,颇费周章,最后考虑到秦简的出土地云梦原属楚之南郡,出土曾侯乙编钟编磬的随县后亦归楚,出土楚帛书的长沙则一直是楚之重镇,三者皆属楚地,故新的书名最后确定为《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》以总括之。该三种书的内容都略有增订,于1993年8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印行。

三是创办大型学术集刊《华学》。

1993年12月,中山大学

敦聘饶宗颐先生为名誉教授及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1994年,饶公筹募资金于中山大学创办大型学术集刊《华学》。他在这一年2月所写的发刊辞中指出,中华文明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。我们所要揭橥的华学趋向有三个方

面:一是纵的时间方面,探讨历史上的重要的突出事件,寻求它的产生、衔接的先后层次,加以疏通整理。二是横的空间方面,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,考察其交流、传播互相摺注的历史事实。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,找寻出它们的条理——错综关系。《华学》由崇圣大学(泰国)、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合编,迄今已编辑出版十二辑,第一、二、五、七、十一、十二辑于中大刊行。我保存有饶公关于《华学》稿件和版式要求的一通书札,是随意写在装文稿的封套上的。他写道:

宪通兄:

各文皆可用,请注意行文及误抄处,望撰者校时能自行改正。简体字应一律改成繁体。排版照北大《国学研究》格式横排,小字注系于篇末,同一版勿分为多段,字排疏点,务使好看。全部排列次序目录盼拟定fax一份来看。

随着通讯工具的发达,来往书札便逐渐为电话、传真所代替了。

四是启动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饶公在信中提到要把“平生论文结集删订”,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启动。最初拟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1993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“关于编辑出版《饶宗颐文集》的方案(初稿)”中提出:“本文集收录饶先生自1936至1993年期间完成的学术专著四十种,论文及其它文章三百篇(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)约六百万字,拟分二十册五年出齐。”饶先生委托本人担任编委会主任。当时在国内聘请顾问十名,编委及特约编委十四名,并在中大梁銛锯堂第三会议室举行“饶宗颐文集编委会首次会议”,向新闻界发出了重大信息,后因经

费等问题未能实现。直至两千禧之年,台湾新文丰出版社找到饶公,表示愿意无条件为饶公出版文集。下面这通书札,是由饶公的女婿邓伟雄先生带来的。信中说:

宪通如晤:

拙集重新安排后,拟命名为《饶宗颐廿世纪学术文集》,面目将为之一新,略志缘起数语,未知当否,请酌。

未刊之新著除《三星堆西南文化创世纪》一书之外,将增入“郭店楚简一观”数篇于简帛学之前,其他有改订及新增之论文,候旧年底归港后一一影出补上,以竟全功。

此书得兄鼎力相助,望能在本年出世,作为古文献廿世纪学术之小结。

……

《在开拓中之训诂学》,拟附入尊著论楚易卦一文,请影出增入,又及。

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终于在2003年10月由新文丰出版社分十四类二十册全书出齐。饶公在此书后记中写道:“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之构思,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当时得廖烈智先生巨资资助,工作得以进行,又得曾宪通教授延揽粤中及中外文史名宿,主持编审文稿,经多次集会商讨,联络出版事宜,浓情渥谊,殊深铭感。惜种种原因,未能成事。至二千禧年底,余在台北‘中研院’主讲,与新文丰出版社高本钊董事长言及此事,蒙其一诺,由新文丰出版社担任付梓。”饶公在给我的信中提到“略志缘起数语”者,即此文集“后记”之谓也。

饶宗颐先生是一位既有“国学”家之渊博,又有“汉学”家之专精,更兼具“华学”家之中华文明史观的特质型国际级大师。他的书札,也同先生的其他精神产品一样,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的睿智和风范,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珍惜的。

(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)



《选堂书札(致曾宪通)》(中西书局,2019年10月)